

朗宓榭 汉学文集

徐 艳 主编

朗宓榭 汉学文集

徐 艳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朗宓榭汉学文集/[德]朗宓榭著;徐艳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4
ISBN 978-7-309-09654-5

I. 朗… II. ①朗…②徐… III. 汉学-文集 IV. K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5557 号



朗宓榭汉学文集

[德]朗宓榭 著 徐 艳 主编
责任编辑/史立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3.5 字数 366 千

2013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654-5/K·423

定价: 6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朗必榭 (Michael Lackner), 1953年生于德国南部的班贝格市, 曾先后就学于海德堡大学与慕尼黑大学, 攻读汉学、哲学、政治学和民俗学。师从著名汉学家包吾刚 (Wolfgang Bauer), 于1983年获得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92—1994年任瑞士日内瓦大学汉学系代理教授, 1994—1999年任德国哥廷根大学汉学系教授, 1999—2000年任日内瓦大学汉学系讲座教授, 自2000年以来, 任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讲座教授暨系主任; 在德国联邦科技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 于2009年创建了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人文研究院并担任院长。

朗必榭的专长领域为宋明理学、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人的命运观, 通晓英、法、中、意、西等多国语言及拉丁文。多年来, 他主持了若干大型学术项目, 如受德国大众汽车基金会资助的“晚清至民国科技术语的形成”, 以及德国学术交流机构资助的“国际质量链接: 中西知识交流——历史和哲学的维度”; 后者进行期间, 仅来自中国的学者、学生就达四十余名。他于2009年创立的人文研究院以“命运、能动及预测: 东亚文化和欧洲文化中的应对策略”为主题, 令德国人文学界耳目一新。

朗必榭曾赴欧亚美诸多学术机构访问并担任客座教授, 如法国人文研究院、德国柏林高等研究院、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上海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日本关西大学、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德国弗莱堡高等研究院、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

朗必榭也担任着多家国际知名学术机构的顾问与学术刊物的编委。作为学者, 他同时也关心和参与学术政治。他提出“forschen mit statt forschen über”, 意即联合“他者”共同研究, 以此取代仅把“他者”作为研究客体的视角。这一洞见得到了德国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谨以此书
庆贺德国汉学家朗宓榭(Michael Lackner)
六十华诞



编者前言

德国学界向来有为教授庆祝六十华诞出纪念文集的传统。一年前,埃
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郑重开会商量此事,有同事别出心裁,建议为朗
宓榭先生(Michael Lackner)出一本中文版的文集。结果这项艰巨的任务就
落在我身上:作为同事和妻子,我责无旁贷。但这个工程之繁重,也出乎所
有同事的预计:其一是朗先生多年来学术成果颇为丰硕,甄选实为不易;其
二是其治学门类广博,路径错综复杂,很难找到懂行的翻译;其三是他用多
种语言进行写作,发表的论文中既有英文的、德文的,也有法文的,当然我们
也挑选了个别中文演讲稿;其四是大量的中国典籍的引文,不能直译,而需
找到中文原文,极为耗时;最后由于我个人工作繁忙,编书工作时续时断,只
能利用节假日进行修订,成书之路,倍感艰难。

好事多磨,这本文集终于与大家见面,编者深感欢欣;同时也想借此机
会,对埃 尔 朗 根 — 纽 伦 堡 大 学 联 合 会 (Universitätsbund Erlangen-
Nürnberg)、大学汉学系(Sinologie an der Friedrich-Alexander-Universität
Erlangen-Nürnberg)、大学国际人文研究院(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for
Research in the Humanities, Käte-Hamburger Kolleg, FAU)以及中国国
家汉办在翻译、审稿及出版资金方面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周振鹤
先生和朗宓榭相交多年,拨冗作序,为该书增色不少。同事王马克(Marc
André Matten)在繁忙的教学中,还专门为该项目向大学所属联合会提交了
申请书,以争取翻译资助,令人感动。文章的各位译者,有的是朗先生的同
事,有的是他的学生或朋友,都慷慨地抽出宝贵的时间,参与翻译工作。其
实,翻译有人为做嫁衣裳之嫌,也是许多学者不愿为之之故。正因如此,我
对所有参与翻译的人都深怀敬意,因文后均有署名,在此就不一一致谢。为
了译文的信达雅,文章都几经校对。在此我特别要感谢张文智、傅有德、吕



凌峰、贺旦思(Dimitri Drettas)、王瑞和杨治宜细致的工作,使译文更臻完美。张文智指导和扶持年轻人的态度,正体现了一位资深学者的大家风度。而杨治宜当时刚从美国赴德任教,自身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但她不仅力承文稿的翻译,同时还挤出时间参与校对,实在难能可贵。同事甘默霓(Monika Gänßbauer)为各篇文章的版权问题,和相关出版社及杂志社进行了联系,谨表谢忱。2012年的圣诞,有两位年轻人和我分担了最后校对编辑工作的痛苦和快乐:王明德文思敏捷,行文凝练,除了前期的校对,还做了许多文字上的润色工作。平时彼此工作繁忙,常常在办公室里擦肩而过;我很高兴,通过精神上的交往,认识了一个人的内在,可谓是“以文会友”。王帆(Florian Wagner)是一个非常有艺术气质的人,却同时有着特别严谨的一面。他统一了各个注脚的格式,这项工作耗时而且繁琐,他的参与在后期工作中给我很大的鼓舞。

莫言曾写道:“长度、密度和难度……是伟大文体的尊严。”朗先生的文章具备密度和难度,且涉猎广泛,但行文多短小精悍。这可能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欧洲人,知晓多国历史和语言的缘故;而作为汉学家,他对自己的要求则是中华上下五千年,说不上每个时期都精通,却偏爱驰骋于不同的年代。也许六十岁以后,他会多一份淡定和从容;在学术创作上,在密度和难度之外,多一份长度,让我们拭目以待。

徐 艳

二〇一二年于德国埃尔朗根

序

周振鹤

我实际上并不适合为《朗宓榭汉学文集》作序，因为一，我对德国汉学史了解并不深刻，二，我对朗教授的学术领域也所知有限。直到这本汉学文集的中文译稿放在我的面前，我才更深地觉察到这一点。虽然我认识朗先生已经快二十年了，但我并没有看过太多他的著作——尤其是德文著述，因为我于德文仅略识之无。因此我自然与现正在读这本文集的读者的起点一样，想通过这本文集了解朗先生的汉学研究的关怀所在。结果大家的认识肯定会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文集所牵涉的学术领域太广泛了：从儒学研究到中西文化关系研究，从图学到占卜相术，甚至于还有漫画。而且在中西关系研究中，从语言接触到思想变迁的有关论文无不功夫到家，令人佩服。

在西方，汉学不但是一项学术兴趣，也是一个职业。常有人误会，既然有外国人热衷于中国学问，那他们必定是因为热爱中国文化。其实不尽然。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一位西方的汉学教授，他坦白地说，他之所以研治汉学，是因为当它是一门学问，而非就个人热爱中国文化与否为出发点。我觉得这个话很实在。汉学本是一门学问，是一门关于中国的学问，而且主要是研究者所在的那个文化里的一门学问，而不是中国本土学问中的一门。这样说或许有点别扭，但事实如此。所以热爱学问本身与热爱所研究的这门学问的背景文化是否一致并不是最要紧的问题。我们只需问这位学者研究水平的高低，而不必去注意该学者是否热爱该背景文化。当然我这样费劲地分开这两个不同概念，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乘便将我自己的理解表达出来而已。

既然是汉学研究者所在文化中的一门学问，那么其研究成果对于中国





人来说就有一个如何理解的问题。有时中国读者觉得不易理解西洋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分析与判断,甚至觉得与常理有悖,那多半是因为我们与他们的文化背景有差异,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对我个人而言,我为什么要看外国汉学著作?那是因为我想要知道,对同一个现象,他人与我们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常常是我们借鉴外人观点的一个好的比喻。西方汉学研究能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恐怕正是在于他们与我们的视角有别,甚至于立场有异,于是他者的观察与我们的理解之间存在的张力或许就推进了一个相对全面的对自身文化的认识。

譬如说,传教士们或许可称为最早的一批汉学家。晚明来华传教士描绘的中国景象虽然不是专门的汉学研究著述,但在当时的确起了类似的作用。但他们所写的各种报告反映的真是中国文化的“真象”吗?恐怕未必。在他们眼中,中国比欧洲先进、理性、有序。他们也明知道中国文化有许多毛病,但佞华的思想仍然在当时的欧洲广为传播,原因是什么?恐怕就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而已。后代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汉学家未必能完全摆脱这种羁绊,但观察的深入与分析的精辟显然是大大超过了他们的前辈。自19世纪以来,汉学在西方就逐渐蔚为一门学问。虽然从业人数不能说太多,但影响显然超过其他的学问,因为既有研究者所在国学术界的关怀,又有研究对象的母国的关注。更尤其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因而汉学领域就既宽广而又深邃,所引起的中国方面与研究者所在国方面的兴趣都比较浓烈。因此西方汉学作为一门学问,其研究对象与方法本身就是引人入胜的。阅读西方汉学家的著作往往能感受到意外的收获,端在于此。

朗宓榭先生作为一位德国著名的汉学家,在中国可能知道的人还不算多。因为他此前还没有论文集被翻译出版,虽然他能利用德英法文字写作,能用汉语做报告,但论文毕竟还是用德文写得多,而德文的学术著述的翻译在中国数量是偏少的。因此这本朗宓榭汉学文集的出版或许不但对理解朗教授本人的汉学成就有益,而且恐怕对德国汉学家的著述的汉译也会起到推动的作用。虽然汉学家未必就要热爱中国文化,但实际上许多汉学家是真诚热爱中国文化的,以德国人而言,20世纪初的卫礼贤就是一个典型。他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结果在传教事业上几乎一事无成,但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却卓有建树,令人怀念。本文集对卫氏恰巧就有专门的研究。朗先生也是属于热爱中国文化的行列中的,他年轻时有机会在德国巴伐利亚图



书馆中文部工作了一段时间,打下了中国文献学的良好基础。该图书馆是德国两大收藏中国古籍的图书馆之一,其中国古籍馆藏的基础就是鸦片战争前到广州专门采购中国典籍的第一个德国人诺依曼奠定的。有这个阶段作基础,加上一贯的好学与兴趣广泛,朗先生于是累积了从事汉学研究的坚实基础。或许从理学开始的汉学研究使朗先生的方向趋向于理性化,而且也使他的研究很重视诠释学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本汉学文集中,诠释史学的部分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如关于西学中源说的深入探索,关于耶稣会士的研究等。诠释史学非我所长,读者必定可以自行发现其精彩过人之处。

朗教授的诠释史学并非空谈,而是建立在扎实细致的基础研究之上的。我们只需看看他关于罗伯聃的生平的考证就可看出。罗伯聃(Robert Thom)在早期中英关系史上是一个重要人物,但中国人对其了解很少。我是因为其对于中英语言接触的贡献才知道他的。1993年我在日本东洋文库做客座研究员时,了解到罗氏所著的《华英通用杂话》与翻译的《伊索寓言》在中英语言接触史上的重要意义,曾在有关文章中有所提及,但对其生平的了解则很有限。但朗先生却花了许多力气,将罗伯聃的生平以及他在鸦片战争后所起的作用做了详细的考证,为我们复原了一个中西文化接触中的“between”人物的具体形象。可见技术史学亦同样是朗先生之所长。但在朗先生这里,诠释史学与技术史学并非截然两途,而是有机地融汇成一体,因此在关于罗伯聃的一文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这并不简单的只是一篇生平的考证文字而已。

朗教授除了著述宏富之外,他还善于争取资助,组织领导大型的学术研究项目。上一世纪最后几年到本世纪初,他就在大众汽车公司基金会的资助下组织了一个大型的“近代中国学术用语的形成”的研究项目,邀请中国、日本以及欧洲北美的学者合作研究,出版学术会议论文集(其中有一种论文集最近已译为中文出版),建立近代学术用语词库,嘉惠学人。我正是在这个项目开始时认识朗先生的。近年来他又建立了一个大的研究基地,是德国教育部支持的全国九大研究基地之一,研究内容主要是中国与欧洲的预测文化(包括占卜、星相、算命、风水一类被人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的对比,吸引了来自世界人文学界的注目,有的学者甚至自带经费参与其研究工作。我就遇到一位来自以色列的自费女学者,就是以邵雍的先天之学为研究对象的。可见该项目在学术性方面的吸引力。兴趣的宽广显然可以促



进研究的深化。朗教授的博士论文是研究中国的梦书的，或许年轻时的这个兴趣促使他在知天命的年龄之后继续深化与扩大这一领域而造成今天的关于预测文化的研究。

我与朗先生认识有年，有许多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或许有一点尤为我们所共通，那就是对旁门左道的偏好——除了对专业以外，对许多旁人不认为入流的学问也感兴趣。只不过我比较容易见异思迁，浅尝辄止，而他却能锲而不舍，坚持下去，做出成绩来。或许还有些共同点，比如他与我都在1983年拿到博士学位，而若以中国农历为譬，他与我同出生于蛇年，只不过他比我小了一轮。朗教授的汉学文字自然不止本书所集，还有许多还在原文形态，请参看附录便知。有兴趣与有外语能力的人不妨接着追索研究，相信朗先生本人也一定欢迎中国读者的批评与反响的。谨以此为序。

2013年3月21日

目 录

编者前言 / 001

序 周振鹤 / 001

一、中西交流 / 001

中国公式? / 003

知识源于东方? ——再议西学中源说 / 018

战争时期的忠诚——罗伯聃(1807—1846)的双重面具 / 032

二、耶稣会士研究 / 049

“他者是多元的”:一位耶稣会士对中国、日本及印度的比较主义视角
(1583) / 051

耶稣会士对中国经书之索隐阐释——以马若瑟著作《中国经书中基督教主要教义痕迹选录》为例 / 065

耶稣会士记忆法,中国心法:浅论记忆的组织 / 098

三、阐释学的思考 / 111

探索未知:道安、严复论西语语法 / 113

卫礼贤:一位“汉化”了的德国翻译家 / 123

目

录



001



部分西方哲学术语在中文运用中的嬗变 / 132

失去了灵魂的黑格尔——中国对黑格尔思想接受中的问题 / 147

四、儒家思想的探索 / 161

文字作为文明之核心要素：儒家人文始祖 / 163

内外俱圣：张载论孔子的双重本质 / 172

哲学、神学还是文化学？——当代新儒家的合法化 / 184

上行下效的儒家思想？——儒家传统作为政治导向之措施 / 197

五、中国传统的图学 / 219

构文为图——《研几图》纵横谈 / 221

图解《大学》 / 249

六、占卜与相术 / 261

另类的科学：民国时期的中国传统相术与西学 / 263

占卜术之风云再起——占卜作为中国文化认同的一个新模块？ / 272

七、文学与艺术 / 293

性感的外国人：当代中国文学的五类叙事 / 295

功夫、龙和冒险——欧洲漫画里中国和中国人的典型形象 / 324

八、书评 / 333

金永植：《朱熹(1130—1200)的自然哲学》 / 335

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 / 338

灵魂不会在沙龙里死去——Thomas Jansen 探究中国文化之诞生 / 344

附录：朗宓榭汉学论著目录 / 351

一、中 西 交 流



中国公式？*

法国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植物学家和民族学家奥德里库尔 (André-Georges Haudricourt, 1911—1996), 是 20 世纪最博学的人物之一, 却从未发表过一部独立的著作, 他被巨大的恐惧围绕着: 总担心自己漏掉什么, 担心错误会悄悄潜入, 担心著作——哪怕是著作中的一小部分——会在出版之前落伍。相反, 他却在自己的演讲中使用化简法, 甚至对于一些高产作家而言, 如此简化都显得太过笼统: “中东地区,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一次他在我本人也在场的演讲中抛出这么一句, “那就是公羊, 是绵羊。那个地区的居民是牧羊人, 他们给自己创造了一个牧羊人的神, 一个大声下命令的, 脾气暴躁的, 却充满爱的神。中国——那是植物 (la Chine, c'est la plante)——中国人用植物的概念来思考他们的宇宙和神灵, 他们以自己在田里当农民的经验来衡量自然与政治秩序的兴衰”。我今天讲座的主题包含了“主叙事”(Meistererzählungen, master narratives) 的概念, 在座各位当中也许会有人提出异议, 认为像“中国, 那是植物”这样如此简短的句子并不完全符合“主叙事”的标准。但是如果您仔细思考一下, 由这个判断句我们可以展开多少和哲学、历史、宗教及日常生活有关的联想, 又可以演绎出一段段怎样的叙事, 那么就可以推知, 即使是看似如此简单的句子也可以成为长篇叙事的基石。

“中国, 那是植物”——像这样在西方历史上对中国文化作出的如此高度概括的宏大构思, 正是我今天想向诸位讲述的内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叙事, 即精辟的叙述, 如奥利弗·高德史密斯 (Oliver Goldsmith) 描写伏



* 该文为作者 2008 年 4 月 28 日在埃朗根—纽伦堡大学讲座系列“面对中国 2008 年作为奥运举办国”的演讲。德文标题为“Formeln für China?”发表在德国政治教育中心的网页上 www.bpb.de/system/files/pdf/I3A1SN.pdf。原文为德文。



尔泰(Voltaire),卡夫卡(Kafka)评价德布林(Döblin)对布莱希特(Brecht)描写的那种;而是对所谓历史、文化的解读能够作出终极的,尤其有制约力的“主叙事”。它们并非都如奥德里库尔那种受结构主义启迪的公式,将中国文化以如此诱惑讨巧的方式统一起来。但是它们的特点正是要找到一个共同点,一个公式,能言简意赅地破解中国之谜。它们致力于高度概括的文化解释学(Kulturhermeneutik),借此去彻底地解释陌生事物。其动机多种多样:可以解释一切的公式有助于减少或消除面对陌生事物的恐惧,或反之引发恐慌;它们也可以使我们自己的文化以最优方式或是最劣方式呈现。通过摄取所谓“陌生视角”,这些公式既可以帮我们改善自己,也可以为我们对“他者”的占有权提供依据。

但是,也有不带幕后动机的宏大构思,它们不涉及权力操控、优劣之分,也没有隐蔽的内涵,而是完完全全源于对认知的兴趣,源于一种应对并解释未解事物之愿望。虽然不是所有的构思,但是绝大部分立足于文明之间的不同,而非共同。对不同点的理解可以多种多样:有无法克服的,有可以沟通的,也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通过权力加以解决的;面对不同点,人们可能产生将其融合的愿望,由此产生第三方。关于这点,我还将多次提及。

和寻常的偏见不同,通过大多数西方描述的中国印象,我们完全可以了解到西方时代精神的变迁;同时成功的中国印象构思也可以教给我们某些关于中国的知识。之所以构思有所不同,首先是因为对事物把握的权重不同。而对事物把握之差异正是由于当事人的不同,并且西方人对自己的理解也有所区别。

虽然吕深(Jörn Rüsen)^①认为,缺少了主叙事,历史学是无法存在的。可是主叙事这个概念本身就附着负面性,即便它早已从孕育它的文学领域进入到哲学,特别是历史学的境内;这样的叙述希望我们相信,历史是可以依照“其本来面目”被呈现的(在此我引用兰克[Leopold von Ranke]^②的话);除此以外,其对过去的解释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并展现了相应的时

① Jörn Rüsen, Michael Gottlob, Achim Mittag(编): *Die Vielfalt der Kulturen. (Erinnerung, Geschichte, Identität, Bd. 4)* (吕深、高络、密塔克:《文化多样性》[《回忆、历史、身份》第四卷]), Frankfurt/Main(法兰克福), Suhrkamp, 1998。

② Wolfgang J. Mommsen(编): *Leopold von Ranke und die modern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莫姆森编:《利奥波德·冯·兰克和现代历史学》), Stuttgart(斯图加特), Klett-Cotta, 1988。